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 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立场，整合多源史料，充分运用比较的视角加强学术反思和评论。蒋凌楠的论文通过剖析梁启超对孟德斯鸠学说的译介与转化过程，展现了清末思想转型中多元主体间的知识互动过程，揭示出清末知识分子立足本土语境重构西学话语的探索实践，为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启示。

梁启超对孟德斯鸠学说的译介及其国民奴隶说的形成

蒋凌楠

[摘要] 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据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来译介孟德斯鸠学说。其文几经摘选与转译，很难呈现孟德斯鸠学说全貌，却突出了对专制国国民奴性的批判。这恰反映了孟德斯鸠带给梁启超的情感刺激，促使他形成了“专制国民奴隶说”的论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进而成为“新民说”的思想前提。梁启超这一“专制国民奴隶说”也影响了留日学生。《国民报》《译书汇编》等刊在《清议报》基础上推进对孟德斯鸠的翻译，且延伸发展了国民与奴隶相对应的论说。“专制国民奴隶说”兼具情感冲击力与思想启蒙意义，助推了“中国专制政体说”在清末的传播。

[关键词] 梁启超　孟德斯鸠　译介　专制国　国民奴隶性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1－0038－014

梁启超传播新学，开风气之先，相关研究经典辈出。立新之际必有破旧之说，也有学者注意到，梁启超对历史和国民性的反思，是他论新民、新政、新学的另一面。[①] 如狭间直树指出，

[收稿日期] 2024－10－18
[作者简介] 蒋凌楠（1987—　），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jln@sass.org.cn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研究”（22JJD770013）阶段性成果。

① 20世纪末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讨论中，郑师渠、崔志海等诸多学者都曾论及梁启超对国民奴性的批判，但没有深入剖析其思想过程，参见袁洪亮：《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21世纪以来梁启超思想的日本因素受到学界重视，对于文本、翻译与知识来源等思想载体的研究成果显著，而从文本溯源方法分析梁启超的批判思想仍有深入空间。

梁启超《新民说》正是由《积弱溯源论》等文对国民奴性、怯懦的历史反思开启的；① 翁有为专门阐述了梁启超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作为其思想中“破”的面相。② 梁启超的批判思想，多源于他流亡日本期间的阅读与反思。③ 本文从梁启超与留日学生吸收孟德斯鸠学说的知识溯源切入，探讨国民奴性与专制政治批判等思想议题何以在近代生成并迅速传播。

前人研究以为“中国专制政体说”的接受与传播，是梁启超等人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日译本影响的结果。④ 但是孟德斯鸠学说庞杂，《论法的精神》涉及中国专制政体的内容十分有限，梁启超不可能仅凭一二段落就完成了由表象到制度的专制批判。实际上，梁启超最初仅从感性上接受了孟德斯鸠的部分观点，后在清末政治变革过程中才逐步将中国专制问题理论化。他受日本语境影响在 1899 年初就使用了“专制”新名词，⑤ 但很晚才在制度意义上重视中国专制政体问题。⑥ 那么，孟德斯鸠学说最初传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对梁启超等清末趋新士人乃至中国政治思想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梁启超专门介绍孟德斯鸠其人其学，先后有两篇文章。先是《清议报》1899 年 12 月 13 日刊《蒙的斯鸠之学说》，这篇短文列在《饮冰室自由书》专栏，后来却没有收入单行本；其后 1902 年 3 月 24 日《新民丛报》发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一文，在前文基础上增补修订了对立君政治的描述、对欧洲专制政治的讽刺以及英国作为立宪政体楷模的大篇幅论述，删去了梁启超论中国情形的按语，最后收入《饮冰室自由书》。换言之，1902 年长文是 1899 年短

---

①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65 页。

② 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③ 发掘梁启超的东学来源是近年研究热点，与本文相关问题如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对梁启超的影响，早在 1990 年就由日本学者宫村治雄提出，郑匡民也指出梁启超多篇西哲学案来源于《理学沿革史》，其自由观也受中江兆民影响，王志松则以《霍布士学案》为例比较分析了梁启超如何接受中江兆民翻译来解释霍布斯民权思想。参见宫村治雄：《梁啓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学〉との関連にお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5 号，1990 年 6 月；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149–169 页；王志松：《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与梁启超的〈霍布士学案〉——*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在中日接受的东亚语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另外，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很早就揭示了留日学生译书与创刊活动情况，但留日知识人在传播西学具体问题上的联系和影响还有探讨空间。

④ 许明龙、侯鸿勋在 1989 年就梳理了孟德斯鸠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论及梁启超及留日学生的译介文章。2000 年前后，史学界就“专制”传入与接受问题引发热烈讨论，甘怀真、罗志田、佐藤慎一、赵利栋、侯旭东、黄敏兰、宋洪兵等都有专论，这一议题延续至今，阎步克、王文涛、张昭军等仍有讨论。其中，侯旭东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对秦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但当时尚没有“专制”一词的新用法来概括中国政体，直到 1899 年梁启超在日本注意到了“专制政体”名词与孟德斯鸠学说，沿用这一概念形容中国政治并传播至后世。参见许明龙：《孟德斯鸠学说的传入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响》，《法国研究》1989 年第 1 期；侯鸿勋：《孟德斯鸠与中国》，《哲学研究》1989 年第 2 期；甘怀真：《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台大出版中心，2004 年，第 533–549 页；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3 期；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40–242 页；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史学月刊》2012 年第 8 期；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⑤ 与梁启超相熟的唐才常在 1897 年就使用了“专制”新名，由于戊戌时期日式史书的引入，梁启超很早就未自觉间熟悉了一些政治、历史领域的日译新语。参见蒋凌楠：《晚清“专制”概念的接受与专制历史谱系的初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62–168 页。

⑥ 张昭军认为，梁启超接受“中国专制说”是一个审慎反思的过程，经历了由“造就新民”到自上而下“改制”的策略转变，《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与《开明专制论》都是建立在专制理论与中国适用性上的制度性思考。参见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文的增补修订版。

梁启超在增订版开篇介绍孟德斯鸠的事迹如创立“三权分立”理论，特别强调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英、美、俄等国相继废除奴隶制、改良刑审制度都源于孟德斯鸠的倡议。鉴于这些贡献，梁启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孟子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近世史中诸先哲，可以当此语而无愧者，盖不过数人焉。若首屈一指，则吾欲以孟德斯鸠当之。”[①] 梁启超为什么会注意到很少被提及的孟德斯鸠首倡废奴，这一印象与学说译介有关联吗？为此，我们先要解决一个文本溯源问题：梁启超这两篇文章究竟是翻译还是概括介绍？

一、梁启超译介孟德斯鸠的原本与重点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译介孟德斯鸠学说是依据《论法的精神》的日译本《万法精理》。[②] 对比文本就会发现，梁启超文不是对应翻译。首先是关于政体三分类，梁启超在1899年与1902年两篇文章中均采用了这样一段叙述：

> 万国政体，可以三大别概括之：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君政体，三曰共和政体。凡邦国之初立也，人民皆慑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权，谓之专制政体。及民智大开，不复统于一人，惟相与议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谓共和政体。此二者其体裁正相反。而介于其间者，则有立君政体，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权受法律之节制，非无限之权是也。[③]

何礼之译《万法精理》与此表达差异较大：

> レプツブリック（共和政治）、モナルキー（立君政治）、デスポテイズム（專制政治）ナリ之ヲ政府ノ三類ト稱ス、此三類ノ形体ヲ知ラント欲セハ、一般ノ字義事蹟ニ就テ之ヲ求ムルトキハ明瞭ナルヲ得可シ、即チ人民ノ全部或ハ其一部ニ一國ノ政權ヲ掌握スル、之ヲ共和政治ト云フ、一君アリ一定ノ憲法ニ則リテ以テ其國ヲ治ム、之ヲ立君政治ト云、一人ノ喜怒ヲ以テ政務ヲ任意放行シ制度法憲ノ之ヲ束制スル者ナキ、之ヲ專制政治ト云フナリ[④]

从文体上看，日译文符合原文，是严谨的议论文体，而梁启超文娓娓道来，更具文采。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表达了不同政体下君权与民权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从专制到共和政体之间有一个进化与过渡的意味，对专制政体更有生动描写，这些都是原文没有的内容。

考虑到梁启超以一篇文章浓缩整本书内容，文字不能一一对应也有可能，但以下更多细节证明了二者的更大差异。文章第二段中梁启超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专制政体的特征：

> 孟氏以为专制政体，绝无法律之力行于其间。君主专尚武力以慑其民。故此种之政，以使民畏慑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赖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
>
> 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蛮，见树果累累，攀折不获，则以斧仆其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之受治于其下者，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吾辈且假日偷乐，及吾死后，则大

---

① 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13–24页。

②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15页。1899年文与1902年文比较，仅有两处用词不同，内容一致，参见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2月13日，第8–9页。

④ 孟德斯鸠：《萬法精理》卷二，何禮之譯，1875—1876年，第1頁。《论法的精神》今译参考：“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用最无知学识的人的观念就足以发现它们的性质。我假定了三个定义，或毋宁说是三个事实：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第2卷第1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页。

乱虽作，复何恤焉。然则专制国民之姑息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蛮民之斫树采果者无异矣。①

这段话藏有一个蛮人斫树的比喻，《万法精理》只有一句：

ルイジヤナノ蠻民、果實ヲ得シト欲スル時ハ其樹ヲ根ヨリ砍テ、之ヲ採ル此事以テ、專制政ノ景況ヲ譬喻スルニ足レリ②

难道梁启超仅凭这一句话阐述出上面一段论证？在他初识西学的阶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查梁文其他段落，在原文中都很难找到完整的对应。如果这些是梁启超自己编撰的，为何要称“学说录要”？原因就在于梁启超确是摘录、转译，但依据的原本不是《论法的精神》日译本《万法精理》，而是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

《理学沿革史》一书原是法国人阿勿雷托（Alfred Jules Emile Fouillée，1838—1912，今译富耶，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的历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③讲述从古希腊至近代的西方哲学家及其流派。孟德斯鸠学说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之列，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之一出现，书中先总论其思想背景与学说大概，再逐条阐述，中间夹有议论。梁启超旅日期间，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是他的重要阅读参考书之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的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培根、边沁、康德等西哲学说介绍都来源于此书。④

梁启超1899年《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翻译了其中介绍孟德斯鸠学说的前半部，内容和结构都契合对应，包括孟德斯鸠哲学的道德基础、法律的精神原则与政体的分类；1902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续篇则增补了后半部分如立宪政治与英国例子等。但梁启超的表达更简洁，1899年文章略写哲学与法律部分，而大半篇幅都在描写专制政体的特征，读后很难不对专制政体下的臣民与君主特征印象深刻。

如前论专制国民犹如砍树野人的比喻，中江兆民日译如下：

夫レ君主其民庶ヲ辑和スルカ為メニシテ、其自由權ヲ奪フテ、武斷以テ、之ヲ恐嚇ス專制政治ノ本旨、蓋シ此ノ如シ然ルニ民タル者常ニ心ニ安ンスルニ非サレハ、真ノ輯和ハ終ニ得可ラス而シテ、畏懼ノ心ヲ懷ク安堵ノ念ヲ保ツトノ二者ハ本ト相容レサル者ナリ、是ノ故ニ專制政治ハ官民俱ニ其目的トスル所ノ者ヲ得ルコト能ハスシテ后已ム他无シ、其机关中固ヨリ相抵触スルノ病ヲ含有セルヲ以テナリ

法律ノ精神ノ書ニ曰ク、ルーイジヤンヌノ民麁鄙ニ無智ナリ、樹果ノ累累タル見トキハ、之ヲ獲ント欲シテ、樹幹ノ地ニ接スル處ニ就イテ斧ヲ以テ之ヲ斫リ樹ヲ仆シテ、然ル後之レカ果實ヲ摘ム、專制政治ノ為ス所モ亦猶ホ此ノ如キノミ

顧フニ專制ノ君ヲ奉スル人民ハ、動モスレハ輙チ言フ、今ノ政府モ亦祚ヲ延フルコト尚ホ二十許年ナルコトヲ得可シ、吾輩猶ホ以テ生ヲ偷ムコトヲ得可シ、我レ死スルノ後、大亂ニ至ルモ復タ何ソ患ヘント、是レハ則チ專制國ニ在リ人民ノ姑息モ、亦彼ノ蠻夷ノ樹ヲ斫リ果ヲ採リテ、慮ヲ後日ニ致スコト無キト異ナルコト無キナリ、モンテスキューノ比喻實ニ妙ナリト謂フ可シ⑤

《论法的精神》一句话的内容，中江兆民这里详加阐释了专制政体之下国民如何思虑而苟且偷生

① 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16–17页。另一篇1899年文也有此段内容。

② 孟德斯鸠：《萬法精理》卷五，何禮之譯，第28頁。今译：“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第5章第13节 专制主义的意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第69页。

③ Alfred Fouillé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C. Delagrave, 1875.

④ 如前所述，宫村治雄、郑匡民曾指出梁启超多篇西哲学案都是以《理学沿革史》为蓝本，黄克武、王志松分别深入分析了康德与霍布斯学案，但未见有对孟德斯鸠学案的深入分析。参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5页。

⑤ アルフレット・フーイェー：《理学沿革史》下，中江兆民譯，文部省編輯局，1886年，第503–504頁。

的原因，描绘出国民的怯懦形象，又归因于专制政体的缺陷，逻辑链条明确，更易于理解。梁启超的翻译与中江兆民大意一致，只是文字更传神，特别是写专制政体“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伤元气”一语，巧妙呼应了蛮人斫树的喻体，承接了上下文论政体的根本。

又如，梁启超文中有一个专制国君主驯民如驯兽的比喻：

> 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时之安为极则也，以故务驯扰其民若禽兽，然时时鞭挞之使习一二技艺，以效己用。民既冥顽如禽兽矣，则其中有一极狞恶而善威吓者，则足以统御之。不宁惟是，乃至不必以人为君，而治之有余。[①]

《论法的精神》仅有这样两句：“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训练野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改变它的主人，不改变所教的东西和所教的步法。这样，只通过两三个动作，把印象灌入脑子里就够了。”[②] 反观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这段与梁文大意一致：

> 又曰ク人若シ禽獸ヲ馴擾シテ、一二技藝ヲ習ハシメント欲スル時時之ヲ鞭撻シテ足ルノミ、若シ其レヲシテ改テ他ノ主ニ事フルコトヲ知ラシムルトモハ萬事已マンノミ專制政治ノ物タル此ノ如キノミ
>
> 又曰ク專制政治ハ、民ノ頑冥ニシテ禽獸ノ如クナル者ニ、宜シ是時ニ在リテヤ衆中一個ノ極メテ獰惡ナル者有リテ、唯衆人ヲ恐嚇スルノ術ヲ善クスルトキハ、以テ君主ト為ルコトヲ得可シ、更ニ一層ヲ進メテ之ヲ論スルトキハ、此ノ如キ頑冥ノ民ヲ統禦セント欲セハ、必スシモ人ヲ以テ君ト為スコトヲ須ヒス[③]

中江兆民和梁启超都以讽刺语气批判专制政体下的君与民皆是畸形变态，“民众之顽冥”与“君主之狞恶”相配。

另外，梁启超1899年的译介文间有按语，联系中国情况进行评论。他初读政体三分类说时认为立君政体与专制政体有相似之处，中国是居于其间的情况，按语写道：“蒙氏所谓立君政体，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④] 而立君政体有一特征吸引梁启超注意，即臣僚矫伪、君主好名，任公认为这切中当时中国政治要害，因而写道：

> 蒙的斯鸠曰，立君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使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立君政体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群臣皆为修饰，或致身效死以征身后之荣，究其实则全属一种矫伪之气而已。
>
> 又曰，立君政体之国，欲其不速归灭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荣与国家之光荣合而为一，如是则必有希合民心，勉强行道之事，而其国亦得以小康。虽然君主好名之极，而群臣之中无高爵硕望可以钤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视如鬼神一无顾忌。[⑤]

再看《理学沿革史》论述这一段更为详细，确为中文本对译来源：

> モンテスキュー又以為ラク、君主政治ノ機關ヲシテ能ク自ラ運轉シテ久ヲ經テ壞裂ニ至ラサヲシムル所以ノ具又一有リ、是レ蓋シ一種矯偽ノ旨義ニシテ深ク臣僚ノ頭腦ニ銘シテ消滅スルコト無シ、所謂矯偽ノ一旨義トハ何ソヤ、曰ク寵爵ヲ以テ自ラ榮トスルノ念是レナリ
>
> 夫レ君主國ノ臣僚皆此一念有リ、是ニ於テ各各相競フテ、其職トスル所ニ孜孜トシテ敢

① 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17-18页。另一篇1899年文也有此段内容，字句有出入。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第70页。

③ アルフレット・フーイェー：《理学沿革史》下，中江兆民譯，第506-507頁。

④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2月13日，第9页。

⑤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2月13日，第9-10页。1902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此段相同，仅有个别字词区别。

テ或ハ怠ラス、位階ノ高下、祿俸ノ多寡ニ從フテ、各各自ラ夸耀スル有リ、所謂王爵ナリ、公侯伯子男ノ爵ナリ、軍人ノ爵ナリ、法官ノ爵ナリ、凡ソ是レ皆夫ノ榮華ヲ渴望スルノ一念ノ寓スル所ニシテ、唯此一念有リ是ヲ以テ群臣皆自ラ修飾シテ甚キハ、或ハ身ヲ挺シ死ヲ致シテ以テ身後ノ榮ヲ邀ムルニ至ル、仔細ニ看來ルトキハ、之ヲ要スルニ矯偽ノ一旨義タルニ過キサルノミ

モンテスキューー曰ク、君主國ノ速ニ滅亡ニ歸セサランコトヲ欲セハ、君主タル者其有スル所ノ諸權ニ就イテ、必ス自ラ榮トスルノ念ヲ懷キ、自尊自重ノ意有リテ、自己ノ光榮ト邦國ノ光榮ヲ混シテ一ト為スコトヲ要ス更ニ之ヲ言ヘハ、君主タル者須ク一種ノ妄想ヲ懷キテ、專ラ光榮盛大ノ美名ヲ以テ自ラ之レヲ己レニ歸スルコトヲ求ム可シ、此ノ如クナルトキハ、縱令未タ善ノ善タルヲ貴フカ為メニ、自ラ戒飭スルニ至ラサルモ必ス善ヲ務メテ、以テ己レノ盛大ノ光ヲ增スコトヲ求メテ、國家斯ニ隆盛ナルコトヲ得ン

然ト雖モンテスキューノ意又以為ラク、君主盛大ノ名ヲ邀ムルコト甚クシテ而シテ、群臣爵位ノ崇キト俸祿ノ優ナルト有リテ以テ、君主ノ威權ヲ鈐制スル無キトキハ、君主必ス自視ルコト鬼神ノ如クニシテ一モ顧憚スル所無キニ至ラン[①]

1899年梁启超另一文章《爱国论》引证：“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②]这一描写就源自上文对臣下矫伪重爵、君主好名的论述，“视如鬼神”的比喻在喻意与批判义上也都相合。到了1901年梁启超写《积弱溯源论》时，“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这一比喻再次出现，批评对象已经从“立君国”变为“专制国”了。[③]可知梁启超在1899年仍不觉中国一定要对应“专制国”标签，但到了1901年确定形成了中国＝专制国＝国民奴性（怯懦、矫伪）的观念。

以上比较可知，中江兆民的译介是来自法国哲学史作对孟德斯鸠学说的阐释，梁启超又在中江兆民的基础上转译、精简与润色。二人的译介都涉及了孟德斯鸠思想的多方面，如三权分立说、政体分类说、地理差异与法的精神等内容。包括开篇提及梁启超对孟德斯鸠首倡废奴与废刑讯的印象，也来自《理学沿革史》。[④]但是梁启超的两篇文章着墨最多、描写生动、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论专制政体的缺陷，其中描写专制国国民怯懦、臣僚矫伪、君主好名等表述，后来多次出现在梁启超的其他文论中，不久也成为同时代趋新士人时评政论的共同论据。

二、初读孟德斯鸠并首提“国民奴隶说”

孟德斯鸠学说的影响不仅在上述两篇译介文章，自1899年起，梁启超阐发国民性问题时处处可见孟德斯鸠的身影。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和谭嗣同、唐才常等多发表批判君权的激进言论，痛陈亡国危机，也曾警告同胞可能沦为他国之奴隶，但从未将国民比作奴隶，也没表达过吾国国民被君主当作奴隶且自甘为奴这一层意思。这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产生的新观念，涉及他对建立现代国家、塑造新国民的新思考。[⑤]这期间孟德斯鸠批判专制国民奴性的论说对梁启超的反面刺激不可忽视，而他的初读感想在两篇译介文之前就已经发表过。

① アルフレット・フーイェー:《理学沿革史》下，中江兆民譯，第510–512頁。

②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第3页。

③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第14页。

④ アルフレット・フーイェー:《理学沿革史》下，中江兆民譯，第469–470、539–546頁。

⑤ 张灏、黄宗智等较早指出了梁启超“新民”思想具有反专制、反奴性的特征，但未见有揭示梁启超国民性批判的来源研究。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124页；黄宗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王圣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4–76页。

梁启超第一次提出吾国民具有奴隶性，是《清议报》1899 年 2 月至 7 月连载的《爱国论》。他自述此时“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①]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外人的批评促发了更多反思。如他留心英人对戊戌变法的评价却发现外人说“中国之人，皆无爱国之心”。[②] 他在《爱国论》写下：“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散涣，其心耎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③]

由此引发提问：国人缘何没有爱国心？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人没有现代国家观念，即“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④] 从深层次看，梁启超提出，是因为专制国民不是国家之主，自然无爱国之心。《理学沿革史》开篇就介绍过，孟德斯鸠认为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种政治德性之上，即爱国，尚自由，重平等”，而君主国和专制国都不是。[⑤] 福泽谕吉也将国民的平等、自由与独立视为爱国心的前提。[⑥] 这在当时已成为明治思想家的共识，自然会感染梁启超。19 世纪末梁启超、郑观应都曾称赞过深山虎太郎《草茅危言》,[⑦] 其中也讲到：“独裁国无爱国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⑧] 这是当时民权思想萌兴的表达，不是梁启超的创新。

值得注意的新观点是，梁启超笔锋一转，引申出其反面论述：在暴君民贼治下，国民“自居奴隶”，则罕有真爱其国者。“民之自居奴隶乌乎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中国则不然，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⑨] 梁启超呼吁国民同胞如今决不可再以奴隶自居。[⑩] 他的关注重点从反君权、兴民权转变为批判国民奴性。

梁启超受孟德斯鸠启发而批评国民奴性，更直接表现在同年底发表的《国民十大元气论》。题为“十大元气”但仅论“独立”一点，其后也无续文。所谓独立，即相对于奴隶性而言，“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⑪] 文章虽然旁征博引，但最重要的论据其实来自孟德斯鸠：

> 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⑫]

如前所述，他引用的这一句是转译自《理学沿革史》，接着描写了士大夫如同畜犬、游妓一样趋附他人，还有意夸张地形容国人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篡贼、贱种一样的君主，至今无怪“西

---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5 页。

② 《论清国政变》,《清议报》第 2 册，1899 年 1 月 2 日，第 15 页。该文是英国传教士口述,《清议报》编译自香港早期英文报纸《孖剌报》。

③ 哀时客（梁启超）:《爱国论一》,《清议报》第 6 册，1899 年 2 月 20 日，第 1 页。

④ 哀时客:《爱国论一》,《清议报》第 6 册，1899 年 2 月 20 日，第 1 页。

⑤ アルフレット・フーイェー :《理学沿革史》下，中江兆民譯，第 468 頁。

⑥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4–15 页。

⑦ 深山虎太郎（1861—1911），本名山根立庵，又名虎之助，日本山口人，曾任地方报纸记者，以汉文诗闻名，1898 年来华，任《亚东时报》主笔，写下《草茅危言》，简介西方民权思想而支持稳健的改革论，在晚清趋新士人中间广为流传。参见戴海斌:《山根立庵、乙未会与〈亚东时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入谷仙介:《近代文学としての明治漢詩》，研文出版，1989 年，第 115–137 頁。

⑧ 深山虎太郎:《草茅危言》,《亚东时报》第 3 号，1898 年 8 月 25 日，第 6 页。此文被多次转载，另见《饮冰室自由书：草茅危言》,《清议报》第 27 册，1899 年 9 月 15 日；深山虎太郎:《民权·共治·君权三论》，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334–337 页。

⑨ 哀时客:《爱国论二》,《清议报》第 7 册，1899 年 3 月 2 日，第 1 页。

⑩ 哀时客:《爱国论二》,《清议报》第 7 册，1899 年 3 月 2 日，第 3 页。

⑪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 33 册，1899 年 12 月 23 日，第 1 页。

⑫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 33 册，1899 年 12 月 23 日，第 3 页。

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①] 梁启超明知“吾今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还是“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②] 表达了难以抑制的激愤之情。文章首尾皆强调了他非常在意西哲的评价，这一篇未完的短文应是任公读孟德斯鸠学说后的即兴之作。

再回看标题《国民十大元气论》，似也与孟德斯鸠有关。传统政治资源有“民气”概念，但梁启超认为“国民元气”与“民气”不同，[③] 解题：“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则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强逼，非宗门之教所能劝导。”[④] 国民元气作为有形的精神表现在于政治法律，这一说法倒非常接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日译本就将首篇目“des principes des trois gouvernements”（今译“三种政体的原则”）翻译为“政府三類ノ元氣”。[⑤] 梁启超似由此借用“元气”一词。[⑥] 此后“国民元气”这一题目萦绕在他心中，直到1902年至1905年《新民说》发表，其中论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等国民应有的各种精神即“国民元气”，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尤其《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几篇再次提及国民的反面——奴隶，但此时立论平和中正，不复见他初读孟德斯鸠时的紧张状态与激烈言辞。而批评国民奴隶性这一反面论点也继续演化出了另一篇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

三、“专制国民奴隶说”集大成者《中国积弱溯源论》

《中国积弱溯源论》是梁启超早期最重要的长篇史论，1901年春夏连载在《清议报》第77册至84册。[⑦] 文章吸收了民权启蒙思想，尤其采纳了孟德斯鸠学说中有关专制国的生动描写和批判性观点，结合中国情形而成一篇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

该文核心论点在于寻找“中国积弱之大源”，“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⑧] 在国民者有奴性，“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⑨] 在政府者，“历代民贼之用此术以驯民、餂民、役民、监民，数千年以迄今矣！其术之精巧完备如此”，导致国民奴性，多“含扰乱之种子”。[⑩] 全文从四个方面论证：理想（即政治理念）、风俗、政术与近事。所谓“理想”指国家（包括政府、君主）与国民之关系，“风俗”一节解释国民奴性的表现，“政术”指君主驯民、餂民、役民、监民之术，“近事”就清代政治具体而论。

---

①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第4页。

②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第2–3页。

③ 梁启超后来专论“民气”：“一国中大多数人，对于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为严重之保障，常凛然有介胄不可犯之色，若是谓之民气。”中国之新民：《论民气（新民说二十五）》，《新民丛报》第72号，1905年1月9日，第1页。

④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第1页。

⑤ 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卷三，何禮之譯，第1頁。

⑥ 郑匡民认为梁启超的“元气”是对应福泽谕吉的“气风”，显然没有考虑孟德斯鸠的影响，但是无论其名词来源，梁启超所理解的“气风”“元气”“精神”的实质是相通的，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内在精神气质、社会风俗。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70–71页。

⑦ 《积弱溯源论》发表后，章太炎随即在《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反驳其中的保皇观点。自《梁启超年谱长编》开始，学界便以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视角解读梁启超此文。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0页。本文从思想资源角度，分析《积弱溯源论》对国民奴隶性批判的论据构成。该文在《清议报》发表时题名《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溯源论》，学界常以《饮冰室合集》所收标题《中国积弱溯源论》指称，内容并无不同。

⑧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第16页。

⑨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第14页。

⑩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第16–17页。

查全篇论据，引用中国传统典籍 14 处、“西儒”8 处（包括 2 次日本思想家），引用史籍人物言论6处、近人4处（包括西方与日本时人2次），引古谚与西谚各1次。孟子在文中出现5次，频率最高，其次是孟德斯鸠 4 次，再次是孔子共引 3 次。作为一篇史论，引用中国古人部分是论述对象需要，相较而言，仅作为论据存在的“西儒”言论分量相当重要，而孟德斯鸠在文中更显突出。

梁启超在文中运用了来自孟德斯鸠的五个经典观点论证，多已出现在前述译介文。首先，以野蛮人斫树比喻论证吾国国民苟且偷生的奴性，成为梁氏的第一个经典论据。① 如前述孟德斯鸠提过一句北美蛮人砍树取果的比喻，经过富耶的解读、中江兆民的译介与梁启超的译笔润色，成就了一段描写专制政体之下国民短视而苟且偷生的精彩论述。

第二，据孟德斯鸠论专制国特征，国民既有奴性则国家内核不安，“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② 这一观点首次出现在梁氏 1899 年译介文中，在描写野人斫树比喻之后即得出。任公还以按语补充两千年来治乱相间的中国史为证，恰符合康有为阐发的“据乱世”特征：“其所谓治者，非真治也，特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实则其中所含扰乱之种子，正多且剧也，故未有经百年治安者。此专制政体之所以必至也。”③ 梁启超认为，这一点切中当时国家问题，即便后来他放弃了康门的三世说，也一直坚持专制国必然扰乱不休的观点。

第三个论证是专制政体驯民如兽的比喻，用以表现专制君主驯服民众的直接手段。如前所述，《论法的精神》原文中专制国驯服野兽是一个讽刺性的暗喻，中江兆民由此阐发了专制君主与民人之间的恶性共生关系，而梁启超明确了批判对象就是专制君主。梁启超在《积弱溯源论》里明喻驯民之术，“使人失其本性，而后能就我范围”，如同花匠屈植，人戏兽使舞。④

第四，梁启超结合福泽谕吉论著得知，孟德斯鸠还曾批评专制政体的服从教育，以为鞭挞、威吓以外的另一种驯民之术。《论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三节专论专制政体的教育是奴性的，目的在使人服从。⑤《万法精理》有相应翻译，但《理学沿革史》并没有专门论述，梁启超一定还参考了其他书籍。《积弱溯源论》和更早的《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文中运用这一论据时都提到了福泽谕吉：

> 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所以使人柔顺屈从也。⑥

这里梁启超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十分明显。首先，福泽谕吉“文明论”中有一种“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阶段论，梁启超深以为然，⑦ 这里用“半开专制君主之国”混合名词，就是一种新旧观念杂糅的表现。其次，福泽谕吉关于半开化的中国与日本的旧教文化的论述，传播广泛，⑧ 与梁启超这一结论相合。最后，梁启超认为服从式教育的批评切中现实症结。明治思想家陆羯南曾经告之，日本名义上效仿文明国家但实际教育仍“以服从政府为之精神”，“假文明之名，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⑨ 梁启超闻之大受刺激，日本维新后进步

---

①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82 册，1901 年 6 月 16 日，第 16 页。

②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82 册，1901 年 6 月 16 日，第 16 页。

③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 32 册，1899 年 12 月 13 日，第 9 页。

④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81 册，1901 年 6 月 7 日，第 13 页。

⑤ 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卷四，何禮之譯，第 8 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第 39 页。

⑥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81 册，1901 年 6 月 7 日，第 13 页；任公：《饮冰室自由书：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清议报》第 33 册，1899 年 12 月 23 日，第 1–2 页。

⑦ 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61–63 页。

⑧ 尤其论及半开化国的特征、智德、历史等内容，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6–17、111、155 页。

⑨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清议报》第 33 册，1899 年 12 月 23 日，第 1 页。

非常，教育尚且如此，相比之下吾国教育自秦以来何其不堪。因而，批评指出专制国教育国民服从性，成为《积弱溯源论》的第四个论点。

第五个论证即前述孟德斯鸠译介文中对于专制国的臣僚“以爵赏自荣之念”的“矫伪之气习”描写。[①] 梁启超认定中国政治弊端主要源于君主运用权术，从而使得臣僚沾染“以爵赏自荣之念”而形成“矫伪之气习”，称为“餂民”之术。[②]

以上论据综合起来，孟德斯鸠学说中的民奴性而国扰乱、臣僚矫伪贪爵、君主驯民如兽、服从教育等论说，被梁启超用以论证专制国君主“驯民”“餂民”“役民”“监民”的四大技艺以及国民奴隶性特征。仅用孟德斯鸠的论据，足以支撑核心论点。该文计约两万字，题眼“积弱”一词在文中共出现 18 次，以此作为对照，全文称“专制”“专制政体”“专制之国”之处共 14 次，称君主为“民贼”共 16 次，而论及“奴”“奴隶”“奴性”高达 52 次。由此更见，文章重点在于运用孟德斯鸠学说来反思国民性、批判政治问题。《积弱溯源论》尖锐地指出吾国国民具有奴性，猛烈批判专制君主的统治术，是梁启超受孟德斯鸠观点刺激而生的一篇批判性史论。

四、留日学生论国民与奴隶并增译孟德斯鸠学说

梁启超译介孟德斯鸠学说之时，与其同门、同办《清议报》的麦孟华也应和宣传，1900 年接连发表《论中国民气之可用》《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等文，讨论国民性问题。麦孟华批判野蛮之国摧锄民气“务使屈伏如牛马，驯谨如奴隶”，而“我中国之无民气也久矣，驯伏于二千余年专制之下，名虽为人，实未尝有一分之人权，名虽国民，实未尝任一分之国事，有奴隶之性质，无国家之思想”。[③] 他也非常关注外人的批评，“以开化傲我，诬黄种为恶劣，诋支那为老大，而犹例我以二千年驯伏专制之人民”。[④] 这与梁启超语数千年吾国民“蜷伏于君主专制政治之下”[⑤] 如出一辙。

麦孟华引申阐释了国民与奴隶的话题，1901 年发表《说奴隶》一文。开篇就由孟德斯鸠论点出发，直言我国民有奴隶性：“孟德斯鸠之言曰，专制政体之国，其人民皆带有奴隶之习性。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其民之与国家交涉，止纳税与服役之事，二者固奴隶之业，自余则靡得与闻也。故今日国事危阽，朝不保夕，而蚩蚩者狃于前朝亡国自治习惯，以为吾知纳税与服役，尽吾奴隶之责任耳。”[⑥] 这些言辞与梁启超同声同气，甚至《积弱溯源论》也有类似段落：“法儒孟德斯鸠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与国家交涉，止有服役、纳税二事。二者固奴隶之业，自余则靡得与闻也。故虽国事危急之际，彼蚩蚩者狃于历朝亡国之习惯，以为吾知纳税与服役，尽吾奴隶之责任耳，脱有他变，则吾亦纳税与服役，尽吾奴隶之责任耳。”[⑦]

麦孟华也谈到，专制国的臣僚对上呈奴性谄媚，对下同样以奴隶待民。“西儒言专制之国，虽当道执权者，亦皆有奴隶之性行。信哉，其言之不谬也。今世之拥封疆尸厚禄，入则美妾俊仆，出则前呼后拥，誃誃然倚以骄人者，罔非谀谄屈贱，操奴隶之术以得之，亦罔非柔媚阿顺，

---

①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 32 册，1899 年 12 月 13 日，第 9 页。

②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81 册，1901 年 6 月 7 日，第 14 页。

③ 先忧子（麦孟华）：《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清议报》第 57 册，1900 年 9 月 14 日，第 1–2 页。

④ 伤心人（麦孟华）：《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 67 册，1900 年 12 月 22 日，第 3 页。

⑤ 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 90 册，1901 年 9 月 3 日，第 3 页；梁启超：《说动力》，《清议报》第 92 册，1901 年 9 月 23 日，第 1 页。

⑥ 伤心人：《说奴隶》，《清议报》第 69 册，1901 年 1 月 11 日，第 2–3 页。

⑦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续）》，《清议报》第 79 册，1901 年 5 月 18 日，第 7 页。

循奴隶之道以保之。”[①] 这些描写与梁启超文意异曲同工。

麦孟华这篇文章引来了留日学生的回应。秦力山早年与维新派交往甚密，1900 年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更接近革命思想，1901 年创办《国民报》。秦力山同时在《清议报》上发表《说奴隶》，在《国民报》上发表《说国民》，屡屡提及奴隶作比较，一破一立，立意明确。

秦力山论国民与奴隶，在梁启超、麦孟华基础上引申了新观点。《说国民》纠正了麦孟华论秦以前三代盛世民气尚存之说，认为所谓国民和民权须有现代民主制度保障，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②] 秦力山表达了对于保皇派一边寄望清帝自动分权一边遮遮掩掩倡民权的不满，强调梁启超起初并不重视的制度因素。《说奴隶》开头就肯定麦孟华对奴性的批判：“谓支那为奴隶之国，可谓一语破的。自秦汉以来四千年中千变万态尽在于是矣。”[③] 随后表示舆论要面向未来，希望我同胞不再为奴，提出了公奴隶与私奴隶，体魄之奴隶与灵魂之奴隶的区别，从不同角度对应着文明国与专制国，自由之国与奴隶之国的区别；提出奴隶之根源在于三纲之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秦力山也提到了孟德斯鸠论专制国民奴隶性等批评的警示，决定《国民报》要继续译介并传播西方政治学说。

《国民报》通常被看作革命派宣传刊物，[④] 很少人留意它和《清议报》的联系。首先，《国民报》主要编辑人员与康梁派保持联系。编撰者自订的任务是一半论时政，一半编译西政书。人员配置上，主笔撰述 8 人，译报、译书各 4 人（西文与东文翻译各半），编辑润色 2 人，校对 4 人。[⑤] 编辑至少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杨荫杭、杨廷栋等人，实际上撰述与编译人员多有重合，以日文闻名的编译者也为其他刊物翻译。[⑥] 主办人秦力山、沈云翔等兼顾政治活动，多发赞美革命与排满言论，但他们原本都曾与康梁交往密切，也在《清议报》发表过文章。[⑦] 包括《国民报》编撰者在内，留日学生早年不同程度上均受维新派思想影响，在海外因爱国心而组织起来，部分趋新留学生又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相聚，后随政局变化，他们思想不断分化，和维新、保皇、革命等政治派别各有互动。[⑧]1901 年 5 月在东京发起的《国民报》，就是一部分留日学生从维新向革命思想过渡的产物。《国民报》的出版发售和《戊戌政变记》等一起，都依靠《清议报》报馆的渠道，[⑨] 可知《国民报》创办时，梁启超是给予支持的，直到后期保皇与革命的争辩激烈，才有《国民报》批评保皇之论。

其次，在传播西学的方向上《国民报》仍在延续《清议报》的议题。《国民报》刊名由来，就是受《清议报》提出的国民与奴隶论说影响。创刊号《叙例》言明：国民为一国之主体，而

---

① 伤心人：《说奴隶》，《清议报》第 69 册，1901 年 1 月 11 日，第 3 页。

② 《说国民》，《国民报》第 2 期，1901 年 6 月 10 日，第 8 页。

③ 公奴隶力山：《说奴隶》，《清议报》第 80 册，1901 年 5 月 28 日，第 1 页。

④ 既有研究一般认为留学生刊物《国民报》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影响，“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盎，开留学界新闻之先河”。这个说法来自冯自由的一家之言，他自述曾参与其事，因而被广为接受。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6 年，第 79 页。

⑤ 《倡办国民报简明章程》，《国民报》第 1 期，1901 年 5 月 10 日，第 2 页。

⑥ 参见范铁权、孔祥吉：《革命党人戢翼翚重要史实述考》，《历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邹振环：《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孙宏云：《杨廷栋：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先驱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3 月 6 日 B03 版。

⑦ 秦力山早年在湖南新政时期受学于谭嗣同，1899 年留学日本即进入梁启超的高等大同学校，参加自立军起义勤王，1901 年 9 月仍有文章发表在《清议报》。参见王德昭：《秦力山——从改良到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660–2662 页。沈翔云是 1900 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的早期留日学生，参与组织励志会，热心政治运动，在人际交往和政治思想方面都曾倾向康梁派，参与自立军起义。参见曾业英：《沈翔云回国参加过自立军起义考辨》，《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3 期。

⑧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 229 页。

⑨ 《清议报》第 88–93 册，1901 年 7 月至 8 月，封底页。

中国国民长期“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反观“西国之民权诚盛”，有赖于近代硕学如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提倡进而政治变革，中国也当由此效仿；因而该报“以唤起国民之精神，讲求国民之义务，自附于播种培根之末”为己任，期待国人由“服从专制”开化过渡到“享西国国民所享之人权”。① 创刊号又有《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论述“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② 希望借鉴 18、19 世纪欧洲摆脱专制政府的历史。

《国民报》连载翻译的第一本西书，就是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直接标明了原著信息，翻译也更加忠实于日文本。编者从中选取洛克、孟德斯鸠等几位著名思想家学说翻译连载，总名之《欧洲近代哲学》。③ 与同为留学生刊物的《译书汇编》比较，《国民报》在翻译西书方面不够专业，但重在传播思想。1900 年末创刊的《译书汇编》专注于译书，长篇幅连载名家原著如孟德斯鸠《万法精理》、伯伦知理《国学泛论》、斯宾塞尔《政治哲学》、卢梭《民约论》等，但这些连载直至停刊都没能完成。而《国民报》刊登时论，以翻译西书辅证。如摘译《理学沿革史》，篇幅可控，短时间即可概览西方主要哲学思想。由此可见，《国民报》对于译介与传播西学的思路，实际上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更相近。

另外，《国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翻译者也有重合。《清议报》1899 年摘译的《理学沿革史》是未完成稿，1902 年《新民丛报》译介文增补了后半部分，这后半部分的译文正与 1901 年《国民报》译文几乎一致。这两种刊物选择了同一翻译文本，可见当时进行翻译工作的留日学生之间，不仅有励志社等组织联系，而且会在不同刊物之间共享译文。至少《国民报》编译者与梁启超到 1902 年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西学译介上互通有无。

除此之外，《国民报》还刊登了《孟德斯鸠之论支那》一文，选取《万法精理》中有关中国但梁启超尚未提及的内容，如卷六第 20 回批评中国刑法的连坐制度，卷八第 21 回反驳传教士对中国的赞美之辞并长篇论中国君主强暴以证专制政体的精神，卷十七第 5 回论鞑靼人同样习得专制政体。④ 翻译遵从日文版，基本符合《论法的精神》原文，而且编译者在其间夹议中国史论，更易激发时人对于孟德斯鸠论中国的理解和联想。

留学生受梁启超影响从孟德斯鸠学说中接受专制国民奴隶说，在其他刊物上也有佐证。1900 年底郑贯一、冯自由等创办《开智录》，他们都曾在横滨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听梁启超演讲与讨论，孟德斯鸠学说是激进学生争相传阅的材料。⑤《开智录》自创刊号起连载翻译《法国革命史》，其中介绍孟德斯鸠自述法国“政府实以犬马土芥视吾民”，⑥ 又译日本人著《自由略论》，“知专制政之不利于国家”。⑦ 在西学感染下反思中国情形，冯自由同意吾国“民贼递起，施专制之暴威，禁士民之言论”，民人“无政治思想，无爱国心，是谓牛马，是谓奴隶”，但他希望通过演说启发国民。⑧ 另一留学生也不得不承认“甘伏于专压政体之下者，是我邦人之特性也”，但同时也相信国民之特性可改造。⑨ 随着国民与奴隶话题渐热，1901 年 3 月《开智录》第

---

① 《叙例》，《国民报》第 1 期，1901 年 5 月 10 日，第 1–2 页。

②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 1 期，1901 年 5 月 10 日，第 4 页。

③ 阿勿雷脱：《欧洲近代哲学》，《国民报》第 2 期，1901 年 6 月 10 日。

④ 《孟德斯鸠之论支那》，《国民报》第 2 期，1901 年 6 月 10 日，第 3–8 页；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卷六，何禮之譯，第 35 頁；卷七，第 12–13 頁；卷十七，第 7–9 頁。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6 年，第 9、62–62 页。

⑥ 涩江保：《法国革命史》，冯自由译，《开智录》第 3 期，1901 年 2 月 20 日，第 6 页。

⑦ 大井宪太郎：《自由略论》，冯自由译，《开智录》第 3 期，1901 年 2 月 20 日，第 7 页。

⑧ 冯懋龙自由氏：《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 1 期，1900 年 12 月 22 日，第 3 页。

⑨ 自强：《国民之特性可改造》，《开智录》第 5 期，1901 年 3 月 5 日，第 7 页。

5、6 期的相关讨论也多起来，如界分不同的奴隶，[①] 讨论如何克服“专制毒”而自养自强，[②] 指出这些前提都在知耻而后勇，“既知为奴隶的耻”，[③] 认识到国人如同孟德斯鸠笔下的状态，方才能开民智，造新民。

综上所论，继梁启超之后，留日学生用不同方式增补译介孟德斯鸠学说。1899 年《清议报》首开其端，发表梁启超《蒙的斯鸠之学说》，摘译自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孟德斯鸠一章前半部分，1902 年《新民丛报》继之连载《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补足了后半部分内容。而这后半部文本在 1901 年就已发表在留学生新刊《国民报》上，同样译自《理学沿革史》，但用法国原作名《欧洲近代哲学》连载。同时，另一留日学生刊《译书汇编》依章节逐字句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日文版《万法精理》并于 1900 年至 1901 年连载，但仅刊登到第三卷为止。作为补充，《国民报》1901 年刊登了《万法精理》后面章节中论及中国政治的部分。以上四种刊物译介孟德斯鸠学说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互补性。政治激进的留日学生普遍接受了孟德斯鸠对专制国国民的批评和梁启超“国民奴隶说”的观点并积极向国内传播。

五、结语

在接触孟德斯鸠学说之前，梁启超已经接受了“中国专制政体说”的一些要素。首先，晚清趋新士人中间已经流行着“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的政治三分类，梁启超到日本后再接触加藤弘之的“专制、立宪、共和”三分类或是孟德斯鸠的“专制、立君、民主”分类之时都没感到新奇。其次，“专制”新名词已经出现在戊戌维新时期报刊，梁启超受日本语境影响也使用它描述过俄国与清廷。最后，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批判过君权肆虐，在君权与民权相对立的概念下为“兴民权”而“讨民贼独夫”。[④] 因而，在初读孟德斯鸠学说时，梁启超已有一定的民权思想基础，没有过分在意他的政体分类新名词，也未纠结于中国是否属于专制政体等问题。

即便如此，流亡日本之后阅读孟德斯鸠学说，还是给梁启超带来了新的思想刺激，它不是理论系统性和知识性的冲击，而是情感上的刺激与共鸣。孟德斯鸠对专制恶政下君臣民的描写，在梁启超看来是一种奴隶性问题，这激发他对中国政治的首要反思对象是国民奴性。

梁启超有两篇专门译介孟德斯鸠学说的文章，来源都不是《论法的精神》日文译本《万法精理》，而是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该书译自法国学者著《哲学的历史》。几经摘选与转译以后，梁启超的译介文章并不能完整呈现孟德斯鸠学说的全貌，但突出了其中对专制国国民奴隶性的渲染以及讽刺专制君臣的描写。

梁启超在孟德斯鸠这些观点基础上反思，形成了“专制国民奴隶说”的论点，尤其集中体现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他利用孟德斯鸠的论据，结合当时的朝野病态，有意更加夸张讽刺地描写了驯民、餂民、役民、监民的君主技艺以及臣民被奴、自居为奴的状态。这些批判性反思进一步成为他构建“新民说”的思想前提。

梁启超的“国民奴隶说”还影响了留日学生。留日学生刊《国民报》就是在《清议报》译介的基础上补充对孟德斯鸠的翻译，并呼应发表有关国民与奴隶的论说，类似讨论在《开智录》上也有体现。另一留日学生刊《译书汇编》则另起炉灶翻译了日译本《万法精理》，以译书的方式参与热议话题。“专制国国民奴隶说”不是系统的制度理论反思，但它既有孟德斯鸠的理论背书，又有批判现实的思想启蒙意义，助推了“中国专制政体说”在清末的广泛传播，并且为梁

---

① 贯公:《奴隶耶抑英雄耶》,《开智录》第 6 期，1901 年 3 月 20 日，第 7 页。

② 自立:《专制毒》,《开智录》第 6 期，1901 年 3 月 20 日，第 9 页。

③ 贯公:《呜呼我国民》,《开智录》第 6 期，1901 年 3 月 20 日，第 1 页。

④ 蒋凌楠:《“专制”概念在晚清的嬗变（1895—1902）》，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3−15、18−28 页。

启超后来从制度上进一步审视中国专制政治历史问题打下了基础。

References

Ding Wenjiang, Zhao Fengtian, ed. *Liang Qichao nianpu changbian* (A comprehensiv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hao).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08.

Huang Fuqing. *Qingmo liuri xuesheng*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1975.

Sato Shinichi. *Jindai zhongguo de zhishifenzi yu wenming* (Intellectuals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Translated. by Liu Yuebi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6.

Sanetou Keishuu. *Zhongguoren liuxue Riben 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ranslated. by Tan Ruqian and Lin Qiyan.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1983.

Zheng Kuangmin. *Liangqichao Qimeng sixiang de dongxue beijing* (The eastern learning background of Liang Qichao's enlightenment thought).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3.

Liang Qichao' s Introduction of Montesquieu and the Formation of Liang' s National Slavishness Thesis

JIANG Lingnan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ln@sass.org.cn)

Abstract: Liang Qichao introduced the theories of Montesquieu,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a Western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Nakae Chomin, known as *Rigaku Enkakushi*. The work was a selective and indirect transl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se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Montesquieu's theories but it highlighted descriptions such as the servility of citizens in a despotic state and the hypocrisy of rulers and ministers, as well as their love for fame. These descriptions reflected the emotional impact that Montesquieu's theories had on Liang. Based on these views, Liang Qichao formed the argument that the citizens of a despotic state like China possess a servile nature, which is prominently embodied in his article *On the Origins of China's Weakness* (*Zhongguo Jiruo Suyuan Lun*). This critical reflection further became the intellectual premise for his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itizen Theory* (*Xinmin Shuo*). Liang Qichao's National Slavishness thesis also influence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The publication of *Guomin Bao* and *Yishu Huibian* by these students further advanced the translation of Montesquieu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in *Qingyi Bao*, and extended the discourse corresponding to "citizen" and "slave". Although these discussions were not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they combined emotional impact with intellectual authority,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despotic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in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iang Qichao, Montesquieu, translation, despotic state, national slavishness